

改革开放与中国政治发展

学术主持人：余逊达

主持人语：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在这40年中，中国的各个领域以及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都发生了巨大且深刻的变化。如何从政治学的视角认识这一变化、解释这一变化？如何把未来的路走得更好？这些是国内外都关注的问题。今年5月，由《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社与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牵头召开了“改革开放与中国政治发展”学术研讨会，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本栏目从会议论文中选取了三篇文章，分别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普遍意义、统一战线的变化和中国经验对转型理论的贡献这三个方面，就改革开放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谈了各自的看法。

DOI:10.14167/j.zjss.2018.09.001

中国改革的普遍意义^{*}

——40年中国政治发展的再认识

□ 燕继荣

内容提要 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和社会变化为人们所认可，但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政治发展未必为人们所认同。基于现代化理论、民主转型理论的一般分析和评估模型，可能会忽略或低估中国政治发展的意义，基于政府创新理论的分析 and 评估或许更能准确反映40年改革开放中国政治发展的进步，这种进步更主要地体现为包括治理理念、治理体系、治理政策、治理行为创新在内的国家治理变革。中国谋求未来发展还要靠创新，这种创新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多项内容，其最终归宿为制度创新。

关键词 改革开放 治理 威权主义韧性 政府创新 政府效能 制度供给

作者燕继荣，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871）

序言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各个学科都在总结中国40年的发展成就和经验，纪念这个伟大的历程，以期找寻能够对国家未来发展有所启迪的

东西。经济学关注经济变化，诸如GDP、产业结构、市场化率、资源配置等经济统计指标自然是论证经济发展的有力证据。社会学关注社会变化，人口变动、社会结构、城市化率、社会组织发展等变量自然是分析社会发展的有效工具。政治学关注政

* 本文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国家治理评估研究”(16JJD810001)的阶段性成果。

治变化,那么,什么指标最能反映中国40年的政治发展?观念更新、公权约束、民权进步、社会稳定、法治进展、制度保障、政府变革、政策开放、信息公开等,应该是最主要的方面。

应当承认,中国的改革具有典型意义,这种典型性不仅仅体现为一国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全球化的巨大潜能,而且也展示了国家治理方式变革的巨大功效。在以往的政治发展评估中,基于专制主义、威权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类型学的研究框架,民主化被赋予特别的意义而成为重要的评估指标,甚至是决定性指标。在这种评估之下,中国由于在被设定的可观察的指标上不具有明显变化而成为学术研究之“谜”——市场导向的经济发展与非西方民主化的政治形态何以共存?一些西方的学者试图用“威权主义韧性”来解开这个“谜团”,但另一种观察角度或许能为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及其积极变化提供解释。

显然,如果把自由民主以及民主选举看作是政治发展的标准性指标,那么,中国发展的某些真实性元素可能会受到遮蔽。如果我们将观察视角和评价标准从民主化发展转向治理变革,中国的政治发展可能会呈现另一番景象,其解释和说明也会形成另一种文本。本文试图用另一种文本解释和说明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变化的性质和意义。

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发展

如果把1840年看作是中国现代化过程起步的时间节点,到现在为止经过了178年。在这178年的时间里,伴随政治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变化,中国现代化犹如一部电视连续剧,情节跌宕起伏,结果惊心动魄。

在强敌如林、内外交困、积贫积弱的满清王朝的最后71年中,中国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洋务运动(1860-1895)、甲午战争(1894-1895)、戊戌变法(1898)、义和团运动(1899-1901)、同盟会成立(1905)、辛亥革命(1911)等重大政治事件,于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宣告王朝统治的终结。

以中华民国为名义的国民党统治全国的37年历史,又经历了新文化运动(1915)、帝制复辟(1916)、军阀割据(1916-1926)、五四运动(1919)、

中国共产党建党(1921)、第一次国内战争(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第二次国内战争(1946-1949)等重大事件,最终以国民党退守台湾、共产党执掌大陆的结局而告终。

1949以后近70年的时段,中国大陆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1952-1956)、三年“大跃进”(1958-1960)、十年“文化大革命”(1966-1976)等重要事件,于1978年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在40年的改革开放中,中国共产党决策领导层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思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先在农村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与管理方式,取代以往的“人民公社制”的生产与管理方式;然后在城市鼓励非公经济方式,并对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进行改制改造;在地方发展中,采用试验区模式,先建立改革开放特别行政区,然后普遍推行经济发展特区模式,最后普遍推广并实现全国的“特区化”;在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的同时,积极加入全球化进程,制定“引进来走出去”的政策,鼓励企业采用多种方式,实现技术和产业升级。

中国40年改革开放获得了巨大回报。就以经济数据来说,40年GDP持续增长6%以上,最高年份1984年和2007年,分别达到15%和14%多。人均GDP从1978年改革开放后5年的380-530多元,提升到最近5年(2012-2016年)的40000-53000多元^①,增长过百倍。

表1 改革开放之初5年和最近5年GDP比较

年份	人均GDP/元	年份	人均GDP/元
1978	385	2012	40007
1979	423	2013	43852
1980	468	2014	47203
1981	497	2015	50251
1982	533	2016	5393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反映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是城市化率。据官方公布的统计结果,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随着经济增长也在快速提升。

有许多统计分析说明中国40年的变化,也有许多统计数据证明中国40年的进步和成就。正是这些亮眼的数字,让更多的人开始讨论“中国奇迹”、“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的话题。

表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情况表

年份	总人口(年末)	城镇人口数	比重(%)
1978	96259	17245	17.92%
1979	97542	18495	18.96%
1980	98705	19140	19.39%
1981	100072	20171	20.16%
1982	101654	21480	21.13%
1983	103008	22274	21.62%
1984	104357	24017	23.01%
1985	105851	25094	23.71%
1986	107507	26366	24.52%
1987	109300	27674	25.32%
1988	111026	28661	25.81%
2012	135404	71182	48.75%
2013	136072	73111	53.73%
2014	136782	74916	54.77%
2015	137462	77116	56.10%
2016	138271	79298	57.35%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http://www.stats.gov.cn/>

总之,在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时段中,中国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救亡图存,谋求国家统一独立,到发展经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一直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探索前行,努力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任务。回顾170多年的历史,应当承认,40年改革开放的时期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最为顺利的时段。尤其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现代国家建设的主题也完全展现开来,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国防建设、生态建设正在渐次推进,并最终转化为国家治理法治化、制度化、民主化、社会化的共识性力量。

客观地讲,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现代国家所需要的基础建设部分,比如,主权的统一性建设,政府的功能化建设,政权的制度化建设,经济生活的工业体系建设和经济组织的企业化改造,社会生活的城市化推进等。但也必须承认,伴随着经济规模、人均收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民生事业光鲜亮丽的业绩,中国依然面临诸多问题,比如,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差别较大,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过高,权力腐败严重,安全事故时有发生,群体性社会抗争事件不断发生。这些现实问题的存在也表明,中国在现代国家之基础建设的稳固性、上层建设的合理性方面

还有短板,在国家生活的制度化、法治化、民主化、市场化、社会化这些被现代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经验和原则的实施方面,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海外中国研究的“困惑”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的时段,但这一事实也引起海外中国研究的困惑。在一些海外学者看来,中国或许本该且早该崩溃的。这种所谓“崩溃论”的观点,大体基于几种理论模型:首先是现代化理论,该理论认为,现代化是17世纪开始的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或客观趋势,它导致人的观念和价值取向向着世俗化、理性化以及个体独立性方面转变,引起社会组织、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生活都市化、生产企业化、组织多样化成为社会普遍特征,进而要求社会管理方式相应地做出调整,以至于法治主义、协作主义、民主主义成为国家事务管理的基本方式。基于该理论的一些海外中国研究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无法顺利应对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将“不出意外”地走向崩溃。

第二种理论是民主转型理论,该理论基于启蒙运动的思想逻辑,认为民主是人类政治的终极目标,因此,任何政体形式,最终都将实现民主转型。在全球日益高涨的民主浪潮冲击之下,中国也像其他威权国家那样难逃“民主革命”之大运,1991年苏联解体和东欧政权巨变必然是中国未来的结果。

第三种是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理论。在经济增长和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日益凸显。以显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计,改革开放前,中国总体基尼系数大致保持稳定在0.3左右;改革开放后,不均衡和收入差距状况急剧变化,2016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总体基尼系数为0.465,而与此前2010年达到的最高点0.481相比,虽有缓慢下降,但也早已突破0.40的所谓“国际警戒线”的水平。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基尼系数长期居于世界前30位,表明中国的客观不平等已经到了较为严重的地步。

基于上述理论,有人预测,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中国在政治上也将发生重大变化,甚至发生像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共产主义“颜色革命”那样的剧变。2010年末由北非突尼斯“茉莉花革命”

开启的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变动,也曾经引起海外学者对中国政治变化的类比性推测。对于那些曾经预言或满心期待中国体制会在改革开放中得到根本改变的人们来说,现实的中国似乎是一种“奇迹”——中国政府不仅没有在历次危机中倒下,反而在“中国崛起”的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巩固。人们试图对这种“奇迹”作出解释,于是,在“中国崩溃论”之后又出现了“威权主义韧性”的说法。例如,美国学者黎安友(Andrew Nathan)提出了“韧性威权主义”(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认为“一种能够对社会需求进行充分回应的威权体系”,是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很长时期内掌握权力并维持统治的关键因素。受他的启发,有的学者提出“行政修补”^②的概念,用以说明中共的执政能力的提升。还有学者用“软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政治体制以及一党执政的“协商式列宁主义”(consultative Leninism)的概念来说明,一个开明的、前瞻性的威权政权可以通过选择增长导向的经济自由化以及对待异议方面采用习惯性的封杀(包括了组织以及集会的自由、投票权以及新闻自由和互联网自由)来延长其存活时间,推迟民主化的到来^③。

从经验和结果角度来说明“威权主义韧性”,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们对于中国政治复杂性的认识,但并没有对中国未来走向给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依然有不少学者对于“威权主义韧性”的暂时性发表了看法。比如,曾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共同主任的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裴敏欣(Minxin Pei)教授,在其《中国陷入困境的转轨:发展中的独裁体制的局限性》(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一书中,给出如下结论:“在一种全国性的改革精神,或富有远见的改革者缺席的情况下,中国似乎走在了一条不知通往何处的长征道路上。中国持续的经济增长只是在证明现行政策是有理的,但却否定了改变的必要性,使得那样的困境将长期存在下去。凭借这一势头,党可以得过且过一段时间,但很难想象中国能够在没有大变动的中途纠偏情况下演变为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民主国家”^④。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包瑞嘉(Richard Baum)于2007年1月17日发文《威权主义韧性的局限》(The limits of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关注到了中国领导人采

取的一系列行政手段,他认为这些手段可以逐步增强社会纳入、协商与吸纳的机制的有效性,但同时指出了从长远来看它在扩大政治问责制、责任制与大众赋权范围方面的有限性^⑤,表达了对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不确定性的看法。

以上这些对中国的研究和预判都建立在现代化理论或民主化经验和解释的一般模型的基础上。这种解释模型大体上可以归结为如下的逻辑链条:现代化(工业化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教育提升+国家开放+信息流动)→民主意识→民主运动(民主革命)→民主政治(“历史终结”)。确实,正如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先前所指出,民主化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趋势,也像近期一些政治学家所认为,民主化是现代化的总体性后果之一。不过,这种基于长期历史发展趋势所形成的一般性分析预测模型,要被用来解释一个具体国家的发展过程,可能还需要更多的现实要素分析的环节。具体来说,民主化可能不一定以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为开始,也不一定与一个所谓“威权政体”的轰然倒塌相伴随。今天,如果需要对中国的研究和预判进行反思和检讨的话,除了中国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执政党自身的改变这些需要特别关注的要素之外,恐怕还需要考虑政治发展目标的多元性、政治发展的阶段性、政治发展实现方式的多样性。

中国政治发展的新理论

民众需求(public demand)和政府效能(government effectiveness)构成了政治分析的两个维度。这二者相辅相成,其互动关系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及发展走向。依据前一个维度去分析问题,民主化或许会成为关注的核心;依据后一个维度去观察现实,政府能力(包括面对民众需求的自主性、回应性、主导性方面的创新能力)将成为考察的重点。

自从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创新理论”以来,“创新”便被广泛运用于管理、组织、政策、文化等不同领域,并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运动”中与政府改革相联系,形成了“政府创新”的概念。政府创新要求政府应当在施政理念、组织制度、操作行为等方面有所变革或创新^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与社会结构的持续变迁,中国政府也开始不断提倡“政府改革”与“政府创新”,无论出于被动还是主动,这一举措都有着深远的政治和学术意义。

在西方发展历程中,民众需求的变化是其政治行政变迁的主要先导条件,因而,西方现代学术传统极为强调基于民众需求变化的政治发展模式与话语阐释体系。而中国现代化的经验表明,政府采取的创新与改革是为了应对更为复杂的、多元主体的需要,政府创新的实现固然离不开来自体制内外各种要素的互动,但它总体上为政府体制内的精英领袖所主导和推动。如果按照政府创新的主体需求来划分,这些动力进一步可归类为人民需要、社会需要、政府需要与政权需要。具体而言,即1.人民需要:保障公民权益(民生、民权)的要求;2.社会需要:协调因社会变化和转型引起的社会群体利益关系的要求;3.政府需要:在有限资源的条件下改善政府绩效的要求;4.政权需要:在国际国内压力形势下维护政权统治(持续稳定)的要求。因此,除了解决当下社会矛盾、提升行政内部效率等直接意义之外,“政府创新”还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政权的存续,它将为理解政治发展与变迁提供崭新的视角与解释模型。

政治学研究通常把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变迁(change)和社会所能提供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过程看作是一种双向运动,把制度供给视为社会需求变化的解决方案。例如,在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分析中,作为一种社会动员力量,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最终转化为一种新的社会需求,这些需求对既有秩序构成挑战,而应对的办法就是提高制度化的水平^⑦。亨廷顿的理论支持了通过积极的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来应对社会变化的主张,也支持了制度供给是社会秩序的决定性要素的观点。

政治学研究告诉我们,制度供给决定国家治理的水平。政府是制度(规则)的主要供给者。因此,政府适应社会需求(甚至“开发”社会需求)并创造性地提供制度(规则)供给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政治的现实状况和未来走向。政府作为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其制度供给状况受制于两个要素的影响:一是政府的主导力(dominant),二是大众的影响力(influence)。

上述话题也可以简化为前文所讨论的民众需求和政府效能间的关系。常识和经验表明,政府无能,百姓受累;政府不昌,民主高涨。政府缺乏足够的政策创新和制度供给能力,以及政府不能公正昌明,都会让民众受害,最终为民主革命埋下隐患。政府既公正昌明,又创新有力,则是百姓的最大福分,也是社会稳定的坚实基础。一部政治发展史,既可以看作是民主化不断实现的历史,也可以看作是政府满足社会需求不断创新的历史。既然依据民主化的经验可以构建政治发展的解释和预测模型,为什么不可以依据政府创新的效能来构建政治发展的解释和预测模型?

如此看来,政府效能的改善,或者说,政府创新解释模型与民主化解释模型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从政府创新的角度看,中国之所以没有发生人们所预期的政治剧变,既可以解释为“民主化惰性”或“威权主义韧性”,也可以归结为中国体制内一直具有不断创新以化解危机的能力。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为了改善治理绩效,中国政府推进了管理导向(如结构性改革、功能性改革、程序性改革、人事改革)、服务导向(如推动公共设施的普及化、构建服务型政府)、自治导向(如推动旨在放松管制、活化社会的改革)、协同导向(如实现多元主体和机制的共管共治)的创新改革,营造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相结合的“协同治理”格局,在具体实践中,一方面开发既有的正式制度和机制的潜力,让政党、政府等权力机构以及传统的群团组织发挥新的机能;另一方面,激活企业、社会组织、社区的功能,让新型社会主体和要素在社会治理乃至国家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努力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的对接,创造了由官方所概括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法治保障”的中国经验。

中国改革的普遍意义

已经有研究用“治理改革”来说明中国40年政治发展^⑧;也有人提出用“从全能主义到权能主义”的命题来予以概括^⑨;还有人将40年治理变革解释为“从制度信任到制度自信”的变化,认为“激活主体活力,打造社会和谐,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三个阶段的突出主题^⑩。无论怎样表述,治理改革和创新应该是中国学者较为认可的解释。

无论怎么讲,中国目前的成就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而不是不改革不开放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政治发展的结果,不可能与民主、自由、法治等为核心价值的政治进步毫不相干。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变化的积极性应该得到肯定。

首先是治理观念变革。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型政党,通过发动和组织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经过长期的武装军事斗争而执掌国家政权,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责任人。革命型政党在组织方式、理论纲领、行动路线等方面,具有革命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特点。1949年建立新政权体系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对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性质形成明确认识,对于自身转型必要也没有形成自觉意识,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仍然采用军事化或准军事化的方式来组织生产和分配,对社会实施计划+运动的集中式管理。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共领导人认识到了国家建设与政治革命是性质和任务完全不同的两个时期,自觉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施政理念,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开启了去革命化、去政治化的过程,努力实现革命党向建设党和执政党的转型。从放弃“阶级斗争为纲”,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再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正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念的积极变化。

其次是治理体系改革。中国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40年,一直与治理体系改革相伴随。40年改革一轮一轮层层递进,不断深化。70年代末期启动农村生产责任制,之后扩展到城市推行企业生产经营责任制,再到90年代开始市场化改革,直到今天全面深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始终不断,并且一直扮演先导作用。80年代启动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这项改革持续深入,从党的领导体制不断调适,到行政体系的8次改革,再到目前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党政体系大体每隔5年就要进行一次重大调整。90年代启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改革,伴随基层民主、社会自治价值意义的逐渐显现和明确,社会组织、社区建设、公民参与等治理机制逐步确立和完善,形成了今天社会治理的新格局。40年体制的变革,使得中国计划型+管制型+动员型体制转化为发展型+计划市场混合型+上层政治协商+基层民主协商型的混合体制。

第三是治理政策变迁。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政府从意识形态导向的政策,转向了发展导向的政策,再向治理导向的政策转变。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一直强调“发展是硬道理”。2003年7月中共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1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强调经济发展,形成了GDP竞标赛,结果导致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结构失衡、两极分化等问题,因此,目前中共执政团队强调“治理”,本意就是针对发展中形成的新问题,要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治理政策。

最后是治理行为调适。40年来,中国的党政主体地位和作用没有发生改变,但现实社会中的政治主体以及党政关系、央地关系、城乡关系、政企关系、政社关系处于不断变化中,而且党政部门及其官员的行为方式也在从严治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得到规范。民众的权益意识、法律意识、民主意识普遍增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官民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治理是中国的事情,但它具有普遍的意义。首先,没有哪个国家、哪种体制是一成不变和不可更改的。那些遭遇国家解体、政权垮台的国家 and 体制,恰恰是坚持一成不变和不可更改、反对改革、拒绝变化的国家或体制。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阐述的两个观点——“革命在苛政较轻的地方发生”和“繁荣加速革命到来”——常被解读为国家解体、政权革命的原因。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这种认定“托克维尔悖论”或“托克维尔定律”的观点,其实只是说明心理效应在法国大革命发生过程中的作用,并不能说明大革命的根本起因^①。一个国家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其观念、体制、政策和行为方式的不断调试变化,正是这个国家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

其次,中国40年改革开放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变革,展示了一个意识形态化的革命型政党的世俗

化意义。革命党必须完成向建设党和执政党转变的自我革新,才能在之后的执政过程中找准自己的定位和方向,进而在世俗化的经济发展中发挥继续执政的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既强调不忘初心,又倡导不断与时俱进,这是它在30多年经济市场化持久高速增长背景下保持继续执政的主要原因。

最后,40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发展历程,展现了国家发展与国家治理的均衡性意义。一个国家,要在发展和治理中寻求平衡,既不能只求发展而不要治理,也不能只求治理而不谋发展。“无发展的治理”和“无治理的发展”都会给国家造成麻烦。中国40年的发展过程正好证明了上述均衡性理论的意义。改革开放初期,有人怀疑一个共产党国家在改革开放中能走多远和能坚持多久;经历持续的经济增长且经济成就突显的时候,又有人把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的破坏、官员的腐败、民主的压制、自由的牺牲、企业的下岗、政府的无限扩张、社会福利的低水平、法治的不昌相联系。现在,恐怕需要中国执政党和中国政府再次通过改革,向世界说明:只要保持开放学习、改革创新的心态和政策,中国完全可以克服上述“陷阱”。

结 语

供需关系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经济学知识框架的基础,二者的关系也应该成为政治学的基础。政治学的供求关系表现为民众需求(人民和社会需要)和政府效能的关系。在以往的学术框架下,人们习惯于从民众需求出发来分析政治发展,沿着“启蒙运动-民主自由-民主运动和民主革命=政治发展”这样的路径来讨论问题。新的政治发展理论要求从政府效能(政府回应能力)出发来分析政治发展,补充分析的思路是“政府回应-制度供给-政府创新=政治发展”。后一种思路更加说明,中国40年的发展实则是中国治理改革创新的结果,也是中国政治发展的重要表现。

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理论主要围绕改革开放并且以改革开放作为主题来阐发出来,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为目标的发展理论成为主流。为此,自由主义市场理论、个体中心主义的政治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新的经济动力的转换,国家面临新的国际和国内问题,需要以问题为导向,

站在世界发展和国家新战略的高度去重构中国理论。为此,治理理论将会成为另一个主流理论。

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还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需要填充新内容,就是要向世界人民提供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为此,中国必须要以中国的经验回答下面的问题:(1)经济是怎么发展的?(2)贫困是怎么治理的?(3)官员腐败是如何治理的?(4)环境是如何治理的?(5)民主化的挑战是如何应对的?(6)法治进步是怎么推动的?任何关心中国发展的人士,恐怕都在满心期待中国能够通过改革创新交出满意的答卷。

从目前来看,40年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最为顺利、发展成就最为显著的时期。然而,最近发生的中美贸易战引发中国经济变局,或许成为中国发展的拐点,将中国推到“再次改革开放”的重要关头。研究表明,一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须依赖于创新的内生增长动力以及宏观效率的不断增进。由此推断,推动中国发展40年的核心要素,关键还在创新。诸如“学习型政党”、“后发优势”、“规模优势”、“人口红利”、“举国体制”、“宏观刺激”等等,不论哪种说词、哪种做法,短期看来或许有效,如果不能转化为“内生增长动力创新”,它所带来的繁荣和成就都难以持久和持续。因此,中国谋求未来的发展还是要靠创新。然而,创新不是一个单项工程和结果,不只是体现为芯片制造和某个工业品的生产加工,而是一个社会“内生增长动力”的全面释放,包括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多方面内容,最终归结为制度创新。

注 释:

①2017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为8865.99美元,折合人民币55412.49元,月均收入为4617.6元,世界排名第69。2016年我国人均收入为8016美元,折合人民币52488.768元,世界排名第72。

②杨大利在《重构中国利维坦》(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一书中,引用由中国高层领导人所做出的有效的“行政修补”方面的许多案例,予以说明中国“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强化,以解释中共执政持续的原因。

③Bruce Bueno de Mesquita and George W. Downs,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05.

(下转第19页)

⑧⑨王丰:《分割与分层:改革时期中国城市的不平等》,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⑩⑪谢宇:《中国社会的特色到底在哪里?》,爱思想网,2016: <http://www.aisixiang.com/data/99459.html>。

⑫两会共议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https://wenku.baidu.com/view/1205b0c64028915f804dc241.html>。

⑬⑭张静:《通道变迁:个体与公共组织化关联》,《学海》2015年第1期。

⑮张静、董彦峰:《组织分化与政治整合》,《文化纵横》2018年8月。

⑯唐文方:《个人意见的公共性:中国六城市居民调查》,《北京大学社会学刊》2004年第一辑。

⑰张静、吴肃然、焦长权:《社会团体与公共利益组织化》,张静主编:《社会组织化行为:案例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

⑱李春玲:《新社会阶层的规模和构成特征——基于体制内外新中产的比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⑲边燕杰:《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0页。

⑳亨廷顿:《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版。

㉑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㉒⑳郑永年:《全球化与中国国家转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68、71页。

㉓《浙江 HZH 市综合考评委员会办公室材料》,第15页,地方政府官网: <http://kpb.hz.gov.cn>。

㉔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2016,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1208/14/29512610_61300038.shtml。

㉕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3~4.

㉖Thelen Kathleen, 2000, Timing and Temporality in the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Evolution and Change, *Studies in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 14, No.1:101~108, 转引自蔡欣怡:《绕过民主: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身份与策略》,第31页。

㉗⑳㉘㉙蔡欣怡:《绕过民主:当代中国私营企业主的身份与策略》,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35、38、24页。

㉚张静:《二元整合秩序:一个产权纠纷案的法律解决》,《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㉛赵鼎新:《绩效合法性、国家自主性与中国经济发展》,爱思想网站: <http://www.aisixiang.com/data/65812.html>。

㉜焦长权:《项目制与政府行为研究》,2017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㉝王晓鲁:《40年改革与中国经济的未来》,《21世纪经济报道》,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8-06-28/doc-ihqppwqx7909063.shtml>, 最后访问:2018年06月28日02:13。

㉞刘明兴、陶然:《中国民生与稳定的政治难题》,FT中文网,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0603?full=y>。

㉟柯卉兵:《中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结构:1998-2015年》,《地方财政研究》2017年第11期。

㊱徐晓新、高世緝、张秀兰:《从美国社会保障体系演进历程看现代国家建设》,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报告, NO.3-01, 总第67号, 第33页。

㊲张静:《利益组织化结构:非同质内聚》,载张静主编:《社会冲突的结构化来源》,社科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㊳浙江基层访谈:浙江嵊州下王镇石舍村党员先锋指数积分量化对照表(2018)。

㊴周雪光:《行政发包制与帝国逻辑:周黎安“行政发包制”读后感》,《社会》2014年第35卷。

责任编辑 陈亚飞

(上接第10页)

④Minxin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Harvard U. Press, 2006.

⑤他指出这些手段主要包括:扩大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功能;增强“统一战线”各机构,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与官方承认的八个“民主党派”建言、协商的作用;创立省、市与县级“电子政府”网站,用于公开政务并获取公众对政府工作表现的反馈意见;增强信访办在协助公民反映国家权力滥用问题上的作用;为遭受国家官员滥用职权之害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并在1999年通过《行政诉讼法》确立下来;通过吸纳企业家、新兴中产阶级与暴发户阶层入党,增加中共的社会代表性与包容性,通过“三个代表理论”将其合理化;提倡新儒家“和谐社会”的文化理念,促进以和平方式解决改革带来的收入与经济机会两

极分化不断增长造成的社会经济利益冲突问题。

⑥燕继荣:《政府创新与政府改革——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目标与路径的思考》,《中国行政管理》2006年第11期。

⑦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的政治秩序》,李盛平、杨玉生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8~59页。

⑧俞可平:《中国的治理改革(1978-2018)》,《武汉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⑨褚松燕:《从全能主义到权能主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

⑩杨雪冬:《从制度信任到制度自信:改革开放40年国家治理变革的主体逻辑》,《新视野》2018年第4期。

⑪高毅:《托克维尔悖论评析》,载于《世界历史》2013年第5期。

责任编辑 陈亚飞

ABSTRACTS

The General Significance of China's Reform —Reconfirmation of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40 Years (4)

Yan Jirong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e economic achievements and social changes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the past 40 years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the world, but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s not necessarily recognized. Based on the general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models of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democratic transformation theory,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may be ignored or underestimated. Th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may more accurately reflect the progress of China's political development, which is more manifested in the reform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cluding four innovations (governance concept, governance system, governance policy, governance behavior). China's future development depends on innovation, which includes knowledge innova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ublic management innovation and so on, and ultimately 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governance;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government innovation; government efficiency; institutional supply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Sociology —What does Chinese Experience Provide for Transformation Theory? (11)

Zhang Jing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response of political sociology research to China's social changes in the past 40 years: China's social changes have avoided huge social unrest, mainly relying not on formal institutional changes, but on grassroots practices of separation of names and realities. On the one hand, China's uniqu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are conducive to different categories and identity groups in society, forming a wide range of interdependent relationships, thereby exchanging or sharing resources, and macroscopically reducing the aggregation of large-scale conflicts.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formal channels that exist widely in society have promoted the emergence of negotiations and private interest alliances. This has become the social support resource for change, also the basic reason why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governance can be slowly expanded. As a stabilizer of social change, the role of this basic structural relationship is to promote the occurrence of informal political integr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theory sets the change and system as the opposite relationship, and the irreversible relationship can not be changed. However, China's experience of change provides a supplementary explanation for this theory: answering the question of why system continuity and rapid change are simultaneously for coexistence. This supplement reveals multiple paths of social change: it can evolve along the confrontational approach of confrontation-systems, or it can be a "separate" approach that deviates from frontal conflicts.

Key words: social change; transformation theory; Chinese experience

New Exploration of CCP United Front Work in Theory and Practice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20)

Liao Xingmiu, Jing Yuejin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CP united front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both in the field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eory, the function of the united front is positioned as "patriotic unity" and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ncentric" theory is proposed to face the increasingly differentiated social structure and multiple interests. In practice, the united front strengthens its own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establishes the large-scale united front pattern of "party and government integration". The object of the united front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uniting all forces that can be united. The